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张金龙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ISBN 7-5423-1158-1

I. 北... II. 张... III. 政治制度 - 研究 - 中国 - 北魏(439534)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10791 号

责任编辑 黄强 薛英昭

封面设计 徐晋林

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

张金龙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30 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400 千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1—2,200

ISBN 7 - 5423 - 1158 - 1/K · 64 定价 : 32.00 元

本书是我自 1985 年至 2000 年所写北魏历史的部分论文的结集，因涉及的主要是关于北魏政治与政治制度史方面的问题，故名为《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本书所收文稿多数曾经发表过，此次收入时依据现在通行的学术规范作了小幅修改，改正了原稿中的一些错误，而基本观点则一仍其旧。

我对北魏历史的兴趣始于二十年前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本科学习时代。记得大二下学期全班同学就将来的专业方向问题曾分头请教系里的知名学者，我和几位对魏晋南北朝史感兴趣的同学专程拜访了入学之初担任系主任的周一良教授和当时正在担任系主任的田余庆教授，受到二位先生的热情接待和鼓励，我曾为油印班刊写了《周一良先生访问记》和《田余庆先生访问记》来记述当时的情形。其后同学们还组成了学习小组，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这种讨论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便不了了之。我和几位同学曾就孝文帝改革问题展开讨论，问题集中到了当时《中国史研究》所发两篇论文上。由于本性使然，我开始搜集这一问题的相关史料，

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并有了要写成文章的想法。在读书思考过程中，曾就一些想法向祝总斌教授请教。祝总斌教授是我史学研究道路上的启蒙恩师。上大学之初，祝老师给我们讲授《中国通史》课（先秦—魏晋南北朝），我最初的中国历史知识主要即得自于祝老师的教导。记得当时除了正常的课堂讲授，祝老师每周还要在二院教研室花一个下午的时间进行辅导，我也曾数次向老师请教。同时由于我担任班长，和祝老师的接触也较多。以后有了问题便登门拜访，每次都能从老师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增长许多见识。祝老师的谆谆教诲和热情鼓励，使我对历史学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坚定了我一生从事历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信念。在其后的二十年间，祝老师还不断给我以关怀、帮助和鼓励。本科期间我选修了祝老师所开“两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专题课，这成为我最初接受政治制度史知识的开始，我后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即得益于当时的学习。

收入本书的论文，有数篇是以大学期间的习作为底稿修改而成的。《“冯氏改革”说商榷》是我所写第二篇论文，也是我所写北魏历史的第一篇论文。本论文即是在以上所说那次学习讨论的促使之下完成的。记得为了撰写该文，我曾投入极大的兴趣和精力，前后抄写资料及文稿达数十万字之多。尽管十分辛苦，但我由此渡过了历史学研究的第一个关口，掌握了史学论文写作的基

本规程，为以后我的研究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祝老师曾几次阅读本文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后来还曾打算推荐到《北京大学学报》发表，考虑到《中国史研究》的专业性以及本文是对该刊论文的商榷，因此他建议我投寄该刊。本文于1985年3月投寄《中国史研究》，一个多月后即收到了用稿通知。这是我第一篇被采用的论文，当时我还是大三的学生，年仅二十岁。虽说文章还比较稚嫩，但毕竟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现在看来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我的最初习作即得到中国古代史权威专业刊物《中国史研究》的首肯，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此后十多年中，该刊一直是我论文的主要刊发园地之一，我感谢该刊几代编辑为此所付出的劳动。

与《“冯氏改革”说商榷》一样，本书所收《北魏孝文帝政治思想散论》、《北魏孝文帝用人政策及其与改革的关系》、《北魏前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征战关系》、《北魏中后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和战关系》等文也都是在我大学所写习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北魏与柔然关系两文是在我大三学年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析分的，原稿曾得到了祝总斌教授的指导。《北魏孝文帝政治思想散论》一文亦是我大三所写习作，曾参与1985年北京大学第一届学生“五四”科学奖的评选，获得最高奖二等奖（一等缺）。此文又曾作为毕业论文得到当时担任系主任的田余庆教授的指导，为此曾数次到田先生家里求教，先生态度严肃，我因过于拘束而未多做请

教，但先生“挤干水分”的教诲至今记忆犹新，尽管我现在所写文字仍达不到“挤干水分”的标准。《北魏孝文帝用人政策及其在改革中的作用》一文则是我大四所写习作，曾获得第二届学生“五四”科学奖三等奖。除了对孝文帝的研究外，大学时代我还就晋武帝与“八王之乱”、唐玄宗时期的法制等问题作过一番考察，但与我后来学术道路发展最有关联的还是对孝文帝的研究。对于为政极其勤勉，勇于彻底否定自我，全盘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使鲜卑民族与中华民族融为一体的北魏孝文帝——古代中国一位杰出的青年皇帝，我是怀着深深的敬意的。《北魏孝文帝时期统治阶级结构试探》一文是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到兰州大学任教之初所写文字，当时对于学界流行的新方法颇有兴趣，曾试图用计量史学方法探讨孝文帝改革，特别是统治阶级结构与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关系。此文曾提交 1988 年在河北邯郸举行的北朝史学术讨论会并收入会议论文集，文字作了很大的压缩。此文的写作颇费功夫，又曾数次修改，比较全面的文本收入拙著《北魏政治史研究》一书中，本不应重收，但考虑两个文本有一些差异，并且此文是我治学道路上一次独特的尝试，故仍将简本收入本书。当时曾打算对魏晋南北朝史上一些关键时期的统治阶级结构用计量方法进行考察（当然，此一课题也可推而广之），但在当时手工操作条件下感到颇费周折，且误差较大，故放弃了这一想法。在当今史料日益数字化的情况下，这

一设想实现的可能性更大。以后我也曾多次运用计量方法，但只是作为研究问题的有益的辅助手段，而不把它作为主要手段。对于新方法新理论，我本人采取不排斥但也不是一味提倡的态度，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为原则。对于传统方法和新方法，我认同某位著名史学家的看法，新方法一定要符合中国历史的情势，而不应为了迎合潮流和引起某种轰动效应而削足适履。

1986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我自己联系到故乡甘肃的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至1995年9月，延续近十年之久。从1987年起为本科生开设了“中国古代史”基础课，并曾开设“北魏史专题”、“两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专题”等选修课。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作为兰州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中惟一的一位“外来户”，作为一个真正的边缘人，因此曾经历过不少烦恼，陷入过一些困境，但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还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同事的称赞，他们给我以很大鼓励，这种情谊至今仍令我颇为感念，成为我知难而进的一种动力。这九年多时间里，在没有任何研究经费支持、生活极为窘迫的情况下，我利用教学之外的业余时间发表了约二十篇论文，这些论文仍以对于北魏历史的探讨为主。

大约从1988年开始，我又将一部分研究兴趣转到了北魏政治制度的研究上来，本书下编有关论文即反映了此后的一些研究成果。对北魏御史台制度的研究是我设

想中的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研究的一部分，但这一设想因故未曾展开，只完成了《北魏御史台制度的发展变化》、《北魏御史台政治职能考论》二文，自信这两篇文稿对北魏御史台制度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对全面认识北魏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意义。《北魏“中散”诸职考》是御史台制度研究中的一部分，但考虑到“中散”制度的特殊性，故单独成文。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也曾利用了计量方法。此文发表前，曾将原稿寄祝总斌教授审阅，他认为有新意并建议投寄发表，并说多年前曾看过台湾郑钦仁有关北魏官僚机构的书稿（是借周一良先生的复印本），涉及“中散”制度，具体内容记不太清，但拙文与其基本观点有别。当时我身处西北，见闻有限，作为一介助教，又无能力到外边查阅有关资料，故无从看到郑书。后来有机缘向著名史学家周一良教授提起，周先生于1994年初将郑书复印稿亲自寄我（时拙稿已经发表），并谓是多年前从美国的图书馆复印携带回国的，现在字迹模糊，他已没有什么用处，让我留作纪念。时先生已届八十高龄，还走了数里路亲自到学校邮局向远在西北的一介助教寄赠书稿，这令我至为感佩。不久就听到先生身患帕金森症的消息。在北京做博士生期间，曾多次打算到先生家中探望，但又怕打扰病中的先生，终未能成行。不过1996年在一次会上仍有幸见到周一良先生，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和先生寒暄数语，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今周先生已逝世一年有余，

但先生关爱鼓励后学的精神将永远铭记于心。1992年秋在周先生家拜访，与先生有过一两个小时的无拘束的愉快的长谈，曾谈到我多年来由于所处环境的限制在读书研究中的“独学无友”，先生颇为认同。还需一提的是，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是我最早阅读的魏晋南北朝史论著，记得在大一第一个寒假回家时便借了此书带回家，在老家读完了此书，深为先生的渊博和精深所折服，这也成了我后来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一个契机。在读了台湾大学郑钦仁教授所著《北魏官僚机构研究·中散篇》后，觉得拙文所论虽与郑书为同一个问题，但观点并不一致，郑书以北魏中散类似汉代郎官，拙文认为其类似汉代御史之职，两说皆有其根据，难以轻易否定。虽然我是大陆学界第一个关注“中散”问题并对之作系统考察者，但学术无地域，从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来看，这一问题的研究当然以郑钦仁教授为开创者。

正当我在工作上处于困境和彷徨之时，我有幸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黎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选择改变了我的学术研究道路，在黎虎教授指导下我开始系统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武官制度特别是禁卫武官制度，这开创了我学术研究的新境界。在此期间，我整理出版了《北魏政治史研究》一书，完成了对北魏洛阳里坊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作为学术界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北魏政治史的专书，《北魏政治史研究》虽不尽完备，但

它的出版，就我而言，是对我自 1985 年以来研究北魏历史的一个总结，反映了我在北魏历史研究里程中的一个阶段。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是我在研读《洛阳伽蓝记》和北魏墓志时较早就关注到的一个问题，这一论题的撰写持续了数年之久，最后定稿是在 1996 年，论文又在某刊“旅行”了两年左右，直到 1998 年 6 月才投寄《历史研究》并最终得以发表。收入本书的《“五职”源流考》一文是我博士论文的副产品，其初稿的完成也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撰写博士论文之际，其定稿则是在第二次去兰州大学工作的一年里，此文曾提交 2001 年 8 月在山西大同——北魏前期首都平城召开的“北朝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七届年会”，并在会上介绍了论文的内容。除此之外，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所撰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涉及北魏禁卫武官制度，与《北魏政治史研究》和本书共同构成了我对北魏历史研究的成果。博士论文现经过数年修改将在近期出版（北魏部分约占七分之一），凡与之有关的论文，无论是否发表过，都不再收入本书。需要说明的是，博士论文最初的选题是“魏晋南北朝武官制度研究”，这一论题的选定要归功于导师黎虎教授的支持。当初我向黎虎师提交了三个论文候选题目，另两题涉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理和南北政治关系，黎虎师考虑到我曾撰写过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论文，遂决定让我以“魏晋南北朝武官制度研

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一决定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我这些年的研究可以说一直都是围绕着相关问题而展开的。我对魏晋南北朝武官制度的研究还应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的《领军将军与北魏政治》一文即标志着我这一探索的开始。由于忙于教学和准备考试，这一计划当时未能展开，而只有到了在黎虎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之时才有了专心从事研究的可能。由于魏晋南北朝武官制度牵涉的范围太广，虽然在做开题报告时有一位教授称赞我敢于选大题目做，但在具体撰写时因时间关系，尝试再三，不得不缩小题目，最终提交了以“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其他论题的撰写在近年仍在时断时续地进行之中。在博士论文撰写的紧要关头，接二连三遇到了一些外界的干扰，对论文的写作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对我身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同时还严重影响到我后来的工作去向。以后数年的漂泊动荡即由此而起。我非常感谢黎虎师为了保护我不受伤害而进行的斗争。事实证明，我并未被压垮，我的学术研究反而走上了一条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生期间，正是导师黎虎教授撰写修订其重要著作《汉唐外交制度史》的关键时期，承蒙黎虎师信任，我有幸成为此书第一位读者，在阅读书稿期间对导师治学旨趣和方法有所领悟，这对我博士

论文的撰写产生了很大启发作用。后来我又联系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汉唐外交制度史》，并受总编张克非教授邀请承担此书编辑工作。张克非教授是我在兰州大学的同事，多年来对我的工作、生活多有关照，是我最为感念的同事之一。其后我又曾承担过数部书稿的编辑或选编工作，于我教学、研究而言是业余的，但它对我的研究工作亦不无益处。本书“附录”收入两篇书评，是我在悉心拜读恩师祝总斌教授和黎虎教授的著作后所写的学习心得，收入本书主要是为了表明我的学术渊源所由，同时也借以表达我对恩师教诲的感激之情。尽管如此，就我初衷而言，还是想尽可能客观地对两位恩师的大著加以如实评介。对于时下由于商业炒作目的而做的没有学术内涵的一味吹捧和阿谀奉承性质的书评，我本人不敢苟同，同时对于借书评打击对方以抬高自身的做法也不以为然。《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评介》写于1991年初，直到1995年才有机会在台湾《新史学》刊出；《汉唐外交制度史 评介》写于1999年初，但一直藏之筐底未能刊出。两稿原本都较长，前文在投稿时就已删去一半字数，此次仍以发表时文本收入，后文收入本书时亦删去三分之一字数。与这两篇书评的命运相似，收入本书的论文从初稿完成到发表大多都经过了多年的时间，如《北魏孝文帝政治思想散论》一文初稿写成于1985年，而后藏之筐底达十余年之久。

科学研究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和扬弃。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要取得些微进步，也必须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无论是否接受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我们都必须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将有关问题推向深入。在我的学术道路上，恩师祝总斌教授、黎虎教授等著名史学家的指导、关怀为我指明了前进方向。多年来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学术论著以及著名学者的传记和治学经验的介绍，从中汲取营养，积累研究素材，古今贤哲的著述为我开启了思想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都是我学术研究道路上的良师益友。北京大学所受的本科教育打下了我一生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学术自由的熏陶养成了我不崇拜权威而力求探索历史真实的秉性，对史学的热爱使我无论处境多么困难也都把学术研究作为我人生的第一追求。当然，史学研究更是我赖以生存的职业，也是我安身立命之本。父母的养育之恩，妻子的关爱之情，亲友的鼓励之谊，都是我能够在冷清沉寂的史学研究道路上坚持下去的原动力。

需说明的是，本书的结集出版有两个因缘：一个是自身的，对于北魏历史我虽仍有不少问题欲做探讨，但由于忙于其他课题，大概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抽身再做比较多的研究工作，因此想对以往的研究做一阶段性的总结。如有可能，还想在近期对《北魏政治史研究》做一次较大的修订。另一个是外在的，本书的出版计划

曾于一年前列入兰州大学“211工程文科精品计划”而提供了出版补贴，感谢兰州大学科研处霍红辉处长所给予的支持；由于我调到山东大学工作，这一计划不得不终止，出版补贴也全部退还给兰州大学。今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提供了出版补贴，才使本书的问世成为可能，谨向学院院长王育济教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甘肃教育出版社总编黄强先生的鼓励和支持，责任编辑薛英昭先生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感谢。最后，借拙著出版之机，我还要对多年来为刊发拙作而付出辛勤劳动的有关杂志的编辑表达感谢和敬意。

是为序。

张金龙

2002年岁末于济南山东大学

上 编

- 1 拓跋 ■ “元从二十一人”考
- 104 从高允《征士颂》看太武帝神 ■ 四年征士及其意义
- 28 “冯氏改革”说商榷
- 52 北魏孝文帝用人政策及其在改革中的作用
- 71 北魏孝文帝政治思想散论
- 104 北魏孝文帝时期统治阶级结构试探
- 121 河西士人在北魏的政治境遇及其文化影响
- 139 北魏河西士人家族三题
- 150 北朝时期的陇西李氏
- 165 李唐出于赵郡李氏说
- 174 北魏前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征战关系
- 190 北魏中后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和战关系

下 编

- 221 北魏太学与政治、文化
244 北魏御史台制度的发展变化
263 北魏御史台政治职能考论
286 北魏“中散”诸职考
300 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
328 北魏迁都后官贵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
343 领军将军与北魏政治
361 “五职”源流考

附 录

- 396 十六国“地方”护军制度补正
413 十六国北魏前期司隶校尉考
427 北燕政治史四题
440 读史札记
470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评介
478 《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

上 编

拓跋 ■ “元从二十一人”考

一

《魏书》卷二八《李栗传》：

李栗，雁门人也。昭成时，父祖入国。少辩捷，有才能，兼有将略。初随太祖幸贺兰部，在元从二十一人中。太祖爱其艺能。

在此，史家明确提出了最初跟随拓跋珪的所谓“元从二十一人”的概念。这一说法在史书中仅此一见。除李栗外，其他二十人是谁？他们的氏族（或郡望）及在北魏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如何？都是迄今为止不曾被学界注意的。我认为，“元从二十一人”的考知对认识北魏早期历史有一定意义，故特考之。

所谓“元从二十一人”，必须具备上引史文所说的“初随太祖幸贺兰部”这一基本条件。拓跋珪幸贺兰部，是指北魏建国前一年（385年）为躲避独孤部谋杀，拓跋珪亡命贺兰部的事件。

《魏书》卷二《太祖纪》：“九年，（刘）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乃将谋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众中，帝乃驰还。是时故大人梁盖盆子六眷，为显谋主，尽知其计，密使部人穆崇驰告。帝乃阴结旧臣长孙犍、元他等。秋八月，乃幸贺兰部。”卷一三《皇后·献明皇后贺氏传》：“后刘显使人将害太祖，帝姑为显弟亢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来告难。后乃令太祖去之。……太祖得至贺兰部。群情未甚归附，后从弟外朝大人悦，举部随从，供奉尽礼。”这两条记载是关于公元385年秋拓跋珪一行逃亡贺兰部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史料。拓跋珪之亡命贺兰部，其影响深远，从近期来看，它是北魏国家得以建立的基础。很显然，“元从二十一人”的支持帮助是这一次政治行动得以成功的保证。

拓跋珪于昭成帝什翼犍建国三十四年（371年）七月七日出生于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之岱海）之北，时其父拓跋寔已在五月间发生的政变中被害，珪即寔遗腹子。^①公元376年，前秦大司马苻洛等部十万兵力进攻拓跋部，代国灭亡。^②时拓跋珪年仅六岁。前秦兵退后，拓跋部由其原附属部族匈奴“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魏书》卷二《太祖纪》：“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幸独孤部。”^③拓跋珪亡命贺兰部之时年十五岁。掌摄部众之刘库仁为其子刘显所杀，梁六眷为显谋主。六眷父梁盖盆原为拓跋部落联盟酋长，他派穆

① 参见《魏书》卷一《序纪》，卷二《太祖纪》。

② 参见《魏书》卷一《序纪》，《晋书》卷一二三《苻坚载记上》。

③ 据《晋书》卷一二三《苻坚载记上》，拓跋珪曾被俘至长安，又曾流放巴蜀。学术界近年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记载。参见：周一良，《魏书札记·崔浩国史之狱》，《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李凭，《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